

龚启昌公民教育思想研究

于玲玲

摘要: 龚启昌是民国时期倡导实施公民教育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他胸怀民族复兴理想,力倡公民教育,培育现代公民。其公民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有: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源于教育自觉,旨在培育现代公民;民族传统文化、现实社会生活、国家共同理想三者构成主要教育内容;倡导家庭、学校、社会三位一体的公民教育方法。研究龚启昌的公民教育思想,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
关键词: 民国时期;龚启昌;公民教育

龚启昌(1905—1989),教育学教授,江苏常熟人。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(现今南京大学)教育系。历任中央大学、南京师范学院教授。龚启昌毕生从事教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,曾开设“教育学”“中学教育法”等课程。发表专著及中小学学科心理研究的论文多篇。对公民教育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作了较系统的阐述,为后人研究民国时期公民教育提供了珍贵史料。

一、民国时期公民教育源于教育自觉,旨在培育现代公民

民国时期,国内既充斥着内忧外患,也孕育着文化觉醒。舒新城指出,近代的中国教育从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”转为“有抉择地褒扬固有文化,有抉择地采用西洋文化”[1](P10)。1919年,教育部确立了新教育宗旨,即“养成健全人格,发扬共和精神”[2](P255)。所谓“健全人格”是指:“一、私德为立身之本,公德为服役社会国家之本。二、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。三、强健活泼之体格。四、优美和乐之感情。”[2](P255)所谓“共和精神”是指:“一、发挥平民主义,俾人人知民治为立国之本。二、养成公民自治习惯,俾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。”[2](P255)该宗旨充分体现了公民教育思想。在其指引下,公民教育思想在民

国初期的教育界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。一些仁人志士为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,积极倡导公民教育,以此改造传统国民,培养现代公民。

龚启昌是民国时期教育界倡导公民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他对公民教育的倡导和研究,源于浓厚的爱国情怀和文化自觉。他强调实施“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”[3](P1)的公民教育,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。其一,民国时期中国境遇的改变呼吁现代公民的诞生。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,民主共和体制登上历史舞台,“在民主政体中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,都得预闻国家的政事”[3](P45),因而欲巩固民主政体,国民的公民身份愈显重要。在龚启昌看来,为应对这一变化,须通过公民教育改变国民因长期生活在封建社会中所呈现的若干“精神病态”,如:“顺民”心理、自私自利、政治冷漠等,从而提升国民的公民素质,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。其二,日益频繁的社会交往需要“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公民”[3](P1)。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侵略与扩张,给社会带来战乱与危机的同时,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社会的联系,地区与地区的交往更为频繁,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愈加紧密。因而,提升国民的公民素质,促进国民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的问题非常重要。龚启昌指出:“在一个团体之中,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共同的活动与利益,每

收稿日期:2019-04-18

基金项目: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(16QD13)。

作者简介:于玲玲,对外经济贸易大学(北京 100029)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,博士。

一小团体与他一小团体,皆有亲密的接触,才算是真正的民主的社会。”[3](P9)因此,要通过“以发展群性为目的”[3](P1)的公民教育,引导国民树立公共精神,使之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民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。其三,民主共和政体下公民常识的普及。在龚启昌看来,在民主共和政体下,国民须改变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”的冷漠心态,通晓公民常识,充分享有公民基本权利,积极履行公民义务,增强对民族、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,较好地诠释公民身份。

总之,在龚启昌的公民教育思想中,公民教育在民国时期的传入与发展,源于先进教育人士为挽救民族危机而引起的教育自觉,旨在培养“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公民”[3](P1),以改良中国近代社会。

二、民族传统文化、现实社会生活、国家共同理想构成其主要教育内容

龚启昌指出:“要发展民族的意识,要涵养民族的德性,至少对于民族过去的文化必须有相当的理解与鉴赏,才能使人有所景从,而可以孕育伟大的人格。过去的文化,这是公民教育内容之第一部分。生在现代繁复的社会,人与人的交往频繁,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亦日益密切,国家是属于大众的,社会是由大众所组成的,休戚相关,祸福与共,众人之事,须由众人管理,因此人人须有运用四权的知识与能力。现代社会生活之了解,四权运用的训练,应为我国公民教育内容之第二部分。我国虽是已立国五千年,但近代的民主政体,则尚在建设途中,究竟要建设成为怎样的一个国家,对于国民应该有所指示,所以未来建国理想的认识,应为我国公民教育内容之第三部分。”[3](P98)由此可见,龚其昌认为,这一时期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应是民族传统文化、现实社会生活、国家共同理想三个部分。

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,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,关乎着一个民族的命脉与发展。龚启昌指出:“过去(的)民族文化为发展民族意识之始基。”[3](P99)他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视为公民教育的首要内容,注重其在养成民族意识中的独特意义。他进一步指出:“语言、文字、文学、美术、历史、地理六种资源……公民教育必须凭借这些资源,以使后代国民了解前代的文化,从而启发其爱国家、爱民族

的意识。”[3](P104)作为中国的现代公民,首先要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相当的认知与鉴赏,这不仅是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重要标志,更是塑造现代公民的主要因素。龚启昌主张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,既不全盘接收,也不全盘否定,要有所选择、有所扬弃。他指出:“时代是前进的,传统必须受着时代的扬弃。合于时代精神的保留着,不合于时代精神的就该被淘汰掉。”[3](P105)只有如此,才能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。

现实社会生活也构成了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。龚启昌认为:“人们不能遗世独立,必得在社会中生活,在共同关系下生活着……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们怎样参加此种社会生活。”[3](P109)借助公民教育,使国民认识到个人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,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与交往。他指出:“就现代人们的生活来说,实是面对着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法律的、社会的各方面的问题,必须了解其实况,而具有参与其活动的的能力。至若道德观念则受传统的影响,受时代的扬弃,必须贯穿在这各方面的生活中。所以,关于这几方面生活知识之教学与技能之训练,为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务。”[3](P109)作为现代公民,需要了解社会的习惯、道德、制度等,遵守社会秩序与法则,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。同时,也要处理好公民与他人、社会的关系,树立公德意识,在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同时,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
“理解过去与认识现实,尚不足完成公民教育的责任。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进步,而此种进步往往是被一种理想所促成。”[3](P117)龚启昌认为,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不仅要传承民族文化,洞悉现实社会,更要树立共同理想。他指出:“一个公民能明了他所处的社会的未来计划与理想,然后他的活动才有了一个最高的目标。”[3](P117)有了共同目标,才可以指引公民的奋斗方向,才能使其将个人理想同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。当然,这里所说的理想,分为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。其中,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共同理想,大同世界是最高理想。公民教育应当引导公民强化对三民主义的认知,树立社会共同理想,进而坚定最高的目标追求。他说:“三民主义是我国建国的原则,那么,对于三民主义的建国方针,自然是每一个公民所不能不了解的。三民主义之终极理想为世界大同,我们的公民教育的目的亦是由国家的进于世界的。”[3](P117)这一点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

教育在方法上具有一致性。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,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,而共产主义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理想。当然,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与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,在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上存在根本差异。

三、倡导家庭、学校、社会三位一体的公民教育方法

“公民教育的领域至广,但论其实施场所当亦不外乎家庭、学校及社会三者。”^{[3](P166)}家庭、学校、社会,作为实施公民教育的重要场所,各有不同的教育要求、标准和重点,因而在现代公民的培养中,既要突出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的教育特色,也要使三者有效整合,形成教育合力。

家庭是公民教育的基础环境,具有强制性、反复性和长期性,其在儿童的“寻常礼貌”“两性道德”“宗教信仰”“良好群性”“勤劳习惯”^{[3](P182)}等方面的训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在家庭教育中,家长的言传身教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,因而家长要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,给予儿童正面的、积极的影响。龚启昌指出,在家庭的公民训练中,家长的暗示胜于命令,奖励胜于责罚,身教胜于言教,肯定胜于迁就,仁慈胜于严峻。^{[3](P184-187)}总之,家庭教育“不论在任何情形之下,积极的总是胜于消极的”^{[3](P188)},所以,要注重积极的引导、正面的肯定、充分的鼓励,引导儿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。

学校,毫无疑问,是实施公民教育的重要场所,它提供系统的、有组织的、有计划的教育,是公民养成良好品质的重要机构。在龚启昌看来,在学校里公民训练的题目多种多样,如学校仪式、班级组织、学校自治会、社交生活、文化生活、健康生活、经济生活、童子军训练、社会服务及义务劳动、纪念日与节日、参观与旅行、间接与直接的教学,等等。^{[3](P204-220)}通过这些的训练,让学生亲力亲为,培养其爱国情感、社会责任感、团结协作精神等道德素质。学校的公民教育,在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各有其特点和侧重。幼稚园的公民教育活动主要有新年设计、国父诞辰、谈话等方式^{[3](P223-224)},发展儿童的积极情感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、对环境的认知等^{[3](P222)},以此培养儿童良好的基本道德情感。小学的公民教育较之幼稚园,其教育方式和目标更为丰富。通过国旗设计、远足设计、图画劳作、国语

常识及公民科教学等方式^{[3](P226-229)},培养小学生的卫生习惯、积极情感、合作意识、团体精神等,由侧重个人道德品质和情感的培育,逐渐转为关注个人与集体、社会、国家间的关系;中学的公民教育较之小学的公民教育更为系统,主要涉猎群己关系、国家政治制度、国家经济制度和伦理思想等^{[3](P242-244)},让学生明白公民个体与集体的紧密联系,培养其集体责任感与义务感。

社会也是实施公民教育的主要场所。其主要教育对象是成人,无系统性,时间较长,易反复。其主要施教机构有博物馆、科学馆、图书馆及民众教育馆等^{[3](P308-309)},其他施教题目有社会服务、纪念日、社会组织、风俗习惯等。^{[3](P265)}此外,报纸期刊、无线电播音、电影与戏剧、鼓书与评话等也是社会教育的场域。^{[3](P301-307)}龚启昌还认为,农村的公民教育和城市的公民教育具有不同的特点。农村的公民教育要基于农村、农民的特点,应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。如,以促进民族独立、民权共享、民生发展为最高原则;扩展农村社会固有的家族观念,培育其社会、国家与民族意识;改进农村家庭生活,健全其组织,并促进其保育功能;普及卫生保健常识,加强保甲及农会组织并积极训练这方面的组织干部;发展农村合作事业,协助改进农业生产技术,提高农民的科学知识;提倡文化教育,改良农民的闲暇生活,发扬农村人民勤劳朴实之固有美德,并鼓励其建立革新精神;提高农民的现代意识,使其开阔视野,认识更大的世界。^{[3](P320-321)}这一倡导,对当今农民的公民教育也大有裨益。当前,我国农业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,且因受经济条件、生活环境、教育程度的影响,农民的公民意识较为淡薄,是当前中国公民教育中的一大现实问题,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亟需解决的一大难题。关于城市的公民教育,因市民文化程度普遍较高,政治意识较强,具有实施公民教育的良好基础。同时,受城市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的影响,城市居民的素质也存在诸多缺点。如,崇尚奢华、不守信义、喜不良娱乐、习性懒惰等^{[3](P332-333)},因此,城市公民教育重在端正其生活态度、提升其道德水平和民族意识等。龚启昌指出,城市公民教育的目标,在于改良都市家庭生活,恢复家庭应有之保育功能;充实公共卫生设备,普及公共卫生知识,养成其注意公共卫生的习惯;加强保甲基层组织,培育民主精神;督导各种产业工会与同业工会组织,并加强其民族利益的意识;督导各类出版物灌输

公民常识,并提高其判断能力;指导电影、戏剧以及广播节目的内容;改良人民的娱乐习惯;提高人民的鉴赏能力;提倡正当礼俗,重课奢靡行为;增设公园、运动场及正当的娱乐设备;利用学校设备推行以公民训练为中心的民众补习教育;充实图书馆及博物馆等的设备;提倡举办各种运动、纪念会,以改良人民的生活习惯、提高人民的公民意识。[3](P337)这样,使城市居民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全面提升其公民素质。

四、结 语

龚启昌满怀爱国热忱,希望通过实施符合本民族特色与文化传统的公民教育,改变国民的落后习惯,塑造高素质的现代公民,最终实现民族复兴。

今天看来,龚启昌的公民教育思想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一是,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借鉴。在新时代,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,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、参与能力愈加重要。公民教育致力于培养国人的政治参与意识、民族意识、公共意识,提高国民对国家事业、社会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,建设新时代的民主政治。二是,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国民的民族意识,增强其民族凝聚力与自信心。我们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问题上,既要重视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,也要注重对其创新发展,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统领全

局,使全体国民同心同德,为完成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魂聚气。三是,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中公民意识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启示。新时期,国家、民族、地区之间的交流、合作与竞争愈加频繁,人类在生产、贸易、科技、文化等领域不断扩大交往,已经迈入经常性的相互需求和相互推动的具有区域化、全球化特征的新时代。当下的中国,在顺应全球化、现代化、信息化的革命浪潮中,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。这对国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基于此,中国公民在国际交流与竞争中,须以一个大国的好国民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,与外国人民互相尊重、友好往来。这是日益崛起的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中国公民必须具备的素质。

当然,龚启昌的公民教育思想也有其历史局限性。一是,在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下,龚启昌研究的公民教育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,旨在构建资本主义民主;而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教育,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,其领导力量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,其宗旨是全面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,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。二是,他所阐述的社会公民教育机构与途径,在今天看来,途径简单,方式落后,已经失去了时代性;在当今互联网时代,社会公民教育的途径非常多,电脑、手机、微信、微博等日益成为人类传播信息的重要途径,且传播迅速、影响广泛,是民国时期无法想象和企及的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舒新城.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[M].长春: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2016.
- [2] 舒新城.近代中国教育史料[M].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2.
- [3] 龚启昌.公民教育学[M].南京:中正书局,1947.

Exploration of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 of Gong Qichang

YU Lingling

Abstract: Gong Qichang was one of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who advocated implementation of civic educ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. He had a national rejuvenation ideal, advocated civic education, and cultivated modern citizens. The main contents of his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s include: Civic education originated from educational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, aiming at cultivating modern citizens;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, real social life, and national common ideals constitute the main educational content; the civic educational method of trinity of family, school and society is advocated. Research on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 of Gong Qichang has positive practical implications.

Key Words: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; Gong Qichang; civic education